

诗禅关系研究的开拓与深化

——喜读程亚林著《诗与禅》

罗 立 乾

禅学,是印度佛学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与改造而演变成的中国化佛学。它对中国古代诗歌和古代诗论的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中国诗学史上,形成了一种诗禅相通的奇特现象。早在40年代,美学大师宗白华就已提出,要考察这种奇特现象,要研究诗禅关系,才能深入理解中国古代诗学及中国艺术精神。然而,从50年代到70年代,诗禅关系研究一直很薄弱。近几年来,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诗禅关系研究,已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课题,而且已发表了一些论此课题的文章;不少文化史丛书中,也有论此课题的篇章。但全面研究诗禅关系而写成专书的,程亚林同志所著《诗与禅》(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还是国内大陆头一本。而我在细细读完它以后,则更感到:此书首次采取比较文化和文化思想史的视角,通过考察印度佛学怎样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与改造而成为中国化佛学——禅学的全过程,对诗禅关系作出了溯其本而追其源的论述,确实是一部取得了开拓与深化诗禅关系研究之成果的力作。

首先,它依据对印度古代早期的一些古籍和一些印度佛经的分析,概括出印度传统文化的特点,是“偏重人生问题,为了‘我’的生命的超脱而厌弃自然、社会,尊崇以我为中心的信仰意志”,“重视内心体验”,因而,印度佛学虽有不同派别,但共同的根本特征,都是重视对超世间的“涅槃”境界,作纯粹精神性的“入定”体验,“强调这种体验和生成这种体验的人的出世性,完全以出世的‘涅槃’作为人生的归宿”,彻底地将人生和世界虚无化。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则是“力图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观念。”此书在作出这些比较的基础上指出:印度佛学正是主要在这种“天人合一”观念的孕育下,才产生了中国化的蜕变而成为了中国佛学的禅学;并且对它究竟是怎样被“天人合一”观孕育为禅学的问题,作出了深入的探究,提出了独到见解。它认为,上古原始的“天人合一”观,是以人和自然的关系为基点;它发展到春秋战国时则演变成了四派:一为孔孟儒学——“天人合一”于社会伦理道德派;二为《易》学——“天人合一”于宇宙规律结构派;三为老子道学——“天人合一”于“无为而无不为”的宇宙功能派;四为庄学——“天人合一”于“无待”境界派;前三派属于社会学,其主题是以“直观外推、内向反控”的思维方式,把社会伦理理想、结构秩序或个体意志的欲求,解释成是同“天”相通又与“天”和谐一致的东西;后一派则属于人格精神哲学,它建立在对精神和生命自由的体验上,其主题是探讨个体精神如何超越“有待”而达到在“无待”的“天人合一”境界中,作非常自由的“逍遥游”。但庄学“天人合一”观的这个主题,从不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也从不将世界和人生虚无化,而只是追求建立一种排除了知性与功利干扰而能出世而入世的超然心态,并强调应以这种超然心态去“观照”世界,在超然“观照”中与“真原”世界合一,使个体精神“在万物展示出真原面貌的环境里,与天地之精神、宇宙之生气融为一体,周游无极……”。因此,庄学的“天人合一”学说,既实际上建立了一种

“超然”的人生态度，又实际上确立了一种超然地“观照”世界的方式。本书以《庄子》中的思想资料为依据，在作出这个结论之后，又论述了庄学对魏晋玄学的渗透和对印度佛学的同化与改造。它认为，魏晋玄学的“体用不二”说和“适意会心”人生观，是对庄学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则经由要享受“适意会心”人生的一批东晋文人之手，特别是经由精于庄、玄之学和印度佛学的东晋佛学家僧肇、道生之手，改造了印度佛学，使之在嬗变为中国化佛学的禅学的进程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其后，经过僧璨、道信、弘忍等人，把这种改造更加以发展，终于由慧能创立了合超然心态本体论与“平常心是道”生活观为一的禅宗，使以出世“涅槃”为人生归宿的印度佛学，最后嬗变成了对世界与人生采取超然“观照”态度的出世而入世的中国化佛学的禅学。因而，形成了庄学、玄学、禅学都强调以超然心态“观照”世界和人生的一脉相承的逻辑系统，使庄学、玄学、禅学在越来越普及化的情况下，有向诗学渗透的可能。本书的这些论述和结论，既较为准确地把握住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很强烈的同化、改造功能，又较为准确地说明了印度佛学经由这种功能的淘洗而转化为禅学的过程，以及禅学与印度佛学的不同特点，并探寻到了其不同特点正是它向诗学渗透的内在原因，从而，不仅开拓出了诗禅关系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深化了对诗禅关系的研究。

本书还全面地从“以禅入诗”、“以禅助诗”、“以禅喻诗”三个方面，具体地说明了禅向诗的渗透。它指出：把禅理的字句和经禅学浸淫而形成的人生观、生活观写入诗中，是“以禅入诗”；移植和改造禅宗的超然心态观照理论，使之成为说明诗歌创作心理现象的直觉性审美观照理论，突出“以物观物”的观照方式在审美派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并以此相标榜形成与“言志派”、“缘情派”鼎足而立的审美诗派的理论，就是“以禅助诗”；用禅学理论来比喻诗学理论，则是“以禅喻诗。”据我所知，“以禅入诗”和“以禅喻诗”两个方面，都已有研究者作过深浅不同的论述。但“以禅助诗”这一禅学在更深层次上向诗学渗透的诗禅关系，则为本书作者首次提出，并作出了深入的探索。它依据对中国古代诗学史的宏观考察指出：“中国化的佛学启发了诗人对审美观照的注意，禅学提高了这种观照的自觉性，并为理解审美直觉、艺术直觉提供了相应的解释。”这一见解富于独创性而又十分深刻。

总之，诗禅关系研究的课题，素来被认为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硬果”“酸果”。而《诗与禅》则确实是取得了开拓与深化诗禅关系研究之丰硕成就的力作。写出这样一本力作，需要作者具有比较丰富、坚实的文化思想史、宗教哲学史、文学史、文艺学、美学诸多学科的知识。而本书作者程亚林同志，还只是一位中年学者，但却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就，实在是令人鼓舞的。荀卿曾有言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程亚林同志之所以能写出这部力作，之所以能对诗禅关系研究能作出具有开拓与深化之功的学术贡献，首先是由于他平日能脚踏实地去作学问，不搞凌空蹈虚的所谓“宏观”（其实是“空观”），而先搞深入分析的微观研究。例如，在写作本书之前，他已发表了一系列对中国古代文论、美学作微观研究的论文，其中，比兴与妙悟之辨的专题论文，对庄子“通而不失于兑”的命题中的“兑”字词义的考释论文，都为他写作《诗与禅》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书亦无完书。本书对儒家建立在情感表现说基础上的功利主义诗学观，未作出公允的评价；充分肯定禅学“以物观物”的观照方式，则认为“以我观物”方式是非审美方式等等，都是有待进一步商榷和研究的问题。

（本文责任编辑 张炳煌）